

◎ 国家图书馆

编

部级领导干部

BUJILINGDAO GANBU

· 2016 ·

历史文化讲座

LISHIWENHUA JIANGZUO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国家图书馆 编

部级领导干部

BUJILINGDAO GANBU

历史文化讲座

LISHIWENHUA JIANGZUO

· 2016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6 /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5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ISBN 978-7-5013-6085-7

I. ①部… II. ①国… III. ①社会科学-干部教育-
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C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873 号

书 名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6

著 者 国家图书馆 编

责任编辑 赵 媛 张珂卿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17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13-6085-7

定 价 85.00 元

主办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文化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承办单位：国家图书馆

目 录

比较文明视野下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	张国刚 (1)
古代中国——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国家	孙 机 (22)
“丝绸之路”文化的叠压式传承与对接	厉 声 (44)
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	周育德 (71)
家风文化 家国情怀	齐大辉 (90)
文化兴国的欧洲经验	朱孝远 (99)
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	姚大力 (131)
孔子儒学与重铸君子人格	牟钟鉴 (152)
埃及文明的再发现	金寿福 (176)
罗马：从城邦到帝国	晏绍祥 (192)
从世卿世禄到选贤任能	
——中国古代入仕制度概述	阎步克 (211)
王阳明的人生与思想智慧	郭齐勇 (227)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张宇燕 (247)

比较文明视野下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

张国刚



张国刚，1956年生，安徽安庆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欧洲留学和执教多年，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剑桥大学、特里尔大学、波恩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和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3）、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

张国刚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隋唐史、欧洲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研究》《唐代家庭与社会》《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德国的汉学研究》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优秀著作二等奖，北京市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华优秀图书奖，是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授，

2014 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一、从“四书五经”谈起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四书五经”这四个字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四书五经”是国学中“经部”的核心部分。“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是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提出的。在当时中国最早的大学——太学中就开设了这五个专业，奠定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最为知名，对“四书”的新解读，援佛入儒，是宋明理学的主要载体。

“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大多诞生于秦朝之前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在先秦时代，它们并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统治者更为青睐的是当时法家、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为何汉朝独独选取了儒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呢？

回眸历史，公元前 770 年秦朝建国，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公元前 206 年秦王朝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仅仅存在了 15 年就灰飞烟灭，这对之后建立的汉朝影响十分巨大。

汉代贾谊曾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huī），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指出秦朝灭亡之因有二：一是不讲仁义即不体恤百姓，二是用打天下的方法去治天下，所以不行。刘邦和他的子孙汉文帝、汉景帝听进去了，所以，刘邦改变了政策，注重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尽量不劳民、不扰民，实施“无为而治”，但刘邦没有真正

从意识形态做一个新的转变。刘邦称帝以后，陆贾和他讲《诗》《书》。刘邦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面现惭色。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之前，到山东曲阜祭拜孔庙，开启了帝王祭孔先河，体现了思想的转变。

从公元前195年刘邦祭拜孔庙，到2015年，期间有2210年的历史。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大一统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常说“秦皇汉武”，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汉武帝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并且确立了“礼法合治”“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从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

此后，中华文明受到外来文明的两次大冲击。一次是汉魏六朝的佛教文明的冲击。隋唐时代，佛教方兴未艾，韩愈晚年因见当时朝廷上下护持佛教，上《谏佛骨表》，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可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但是，中国人通过逐渐地学习、吸收佛教，使儒家文明在沉沦中获得新生，即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精华而获得更化。另一次是明清以来欧西文化的冲击。刚开始的时候，从徐光启一直到康熙，都对西方文化有兴趣。徐光启带着很明显的目的，即想用“天学”来丰富发展儒学。康熙学习西方科技，对西方的医药、数学以及自鸣钟、钢琴等都感兴趣，康熙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使他对传教士也很重视。但是，当时我们学习西方的方式却受到了西方的反对，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即中国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罗马教皇不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祀孔。中国人不祭祖、不祀孔，那还是中国人吗？所以，康熙就很烦恼，亲自与罗马教皇交涉，但罗马教皇表现得很蛮横，派来特使

铎罗 (M. de Tournon)。铎罗与康熙见过三次面,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康熙直言警告铎罗,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称天主教必须与儒学和谐共处,若反对祀孔祭祖,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吸收基督教时,受到了对方的阻挠。他们不准中国人祀孔祭祖,因为是偶像崇拜。西方人的这种表现是原教旨主义吗?不是,它的背后其实是最世俗的利益,因为法国人觊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的利益,不愿意其被葡萄牙所占有,所以利用葡萄牙人传教离经叛道这一点来打击葡萄牙人,染指中国的传教事业,实际上这是以神圣的名义包装的世俗利益。二百多年之后,1939年罗马教皇下旨,中国人可以祀孔祭祖了,可是连个道歉也没有,一个和平的文化交流被迫中断了。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屡受挫败,逐渐失去了文化自信。晚明、盛清时期主要是拒绝西方,固步自封;“五四”至“文革”,则又调到另一头,全盘否定自己,“打倒孔家店”,失去对中华文明的自信。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中国,不仅有一个政治新常态要依法治国,经济新常态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型,即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用中国的话讲中国的故事,从中国的历史中说清中国的道路,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体系。

正如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时,讲到的仁爱、民本、信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传承是照着讲，升华是接着讲。宋明理学是对汉唐儒学的传承和升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也是中国共产党红色经验的传承和升华。但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建设是比较滞后的，它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总要在事实推动以后。因此，道理好说，但真正做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如三国时期，孙权刚刚接哥哥的位，鲁肃就与他讲江东的发展大计，但孙权不能表态，因为他还要与曹操周旋，要与朝廷搞好关系，如果按鲁肃讲的直白地去做，就会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是说，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和把这个道理在实践中与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是两回事，在野的人讲道理，在朝的人要讲操作。

国学中的“子部”大概相当于专业学术方向，墨、兵、法、农、医、天算、术数、艺术等等，很像大学中的专业名称。而国学中的“史部”——历史，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恩格斯讲，历史是我们的一切；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我们无不是通过历史作为判断的依凭。所以，中国学问中最重要的是经史之学。

曾国藩说过，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做人做事都要读经，因为经学讲究“修身”，主要告诉你做人做事的道理。经邦济世则要读史，史书告诉你操作的案例。光学习道理是不够的，道理是抽象的，有严格的限定条件，脱离了具体环境和约束条件，各种道理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例如，人们常说，“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可俗语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些看似矛盾的俗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在里面，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所以，读经之外，还应读史，史书能提

供具体的操作案例，明白道理的边界在哪里。

哪本历史书最好呢？曾国藩说：“窃以为先贤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曾国藩用八个字总结《资治通鉴》的特点：“穷物之理，执圣之权。”

《资治通鉴》不仅得到曾国藩的高度评价，而且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反复读过17遍。他讲“每读，都获益匪浅”。

《资治通鉴》不仅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而且还将怎么操作说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权变”。“权变”是道理之外的东西，它是超越道理的，面对权力、社会、经济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史书把执政者的应对技巧、成败得失记载下来，作为政治事件的鲜活案例，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历史。在解决问题时，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智慧，例如香港回归，由于其复杂性，我们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学习古人之“权变”经验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一国”是道理，“两制”是权变。

历史有着其独特的优越性和十分重要的作用。“道理”是底线，“权变”是操作，“读史使人明智”，如何在把握底线的前提下灵活操作、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学习历史应该有的智慧。所以，如果仅凭自己个人的经历，来对外界做出判断，这叫匹夫。如果能吸收古今中外的经验来丰富自己，这才是成功的奥秘。

二、比较文明视野下中国历史与文化特色

我把人类知识体系分为关注自然、关注现实人生与社会、关注超自然三部分。关注自然，如声光电化等；关注超自然，如宗教神学。分类是认识事物的办法，这样分类方便我们认识事物。

在世界地图出现之前，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作。美洲是土著印第安人，撒哈拉沙漠以南是土著

黑人，澳洲是土著毛利人。他们当时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基本都垮了，或者被同化了，或者被赶到深山老林里去了，真正的具有文明古国的是欧亚大陆及北非。

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文明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类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欧之间的南亚、西亚、北非的中近东文明。这三个文明各有特点。

西方文明最重视的是科学以及科学的精神。科学是西方知识皇冠的明珠。古希腊文明认为追求真理比追求实用重要，科学是逻辑，而哲学则是与科学并重的一门学问。当时雅典学院教四门课：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学院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欧几里得教几何，学生问，老师你讲点、线、面有什么用？欧几里得拿了一枚金币说，这个有用，拿着出去。几何有什么用？求真而不完全求用，这就是科学精神。正是因为求真不完全求用，才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然后变成新的生产力。所以，欧洲搞原创的多，中、日、韩则是把原创搞得更便宜、更普及、更精细，这就是对知识的态度不同。我们讲创新，但我们的创新，往往在操作层面，对其科学原理没有更多的提倡和追求，因此我们总是要去学习，总是跟着人家后面跑。

南亚、西亚、北非的中近东文明产生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以色列，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以宗教和神学区别于其他文明。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最重视的是现实中的人生问题。所以《论六家要旨》里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此务为治者也”，这些都是讲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只是走的路径不一样，有的清楚，有的不那么清楚而已。

为什么人类会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文明、三大知识体系呢？

这与每个民族所走的道路、所经历的历史有关。农村、山里、城里以及海边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经历、经验不同，世界认知感也不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知识特征反映的是它们走过的不同道路，所以在知识体系里面，排的顺序就有差别，重点、重心不一样。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一）国家治理结构

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建立在编户齐民体制上。所有的“民”，不管富贵贫贱，都编在户籍上，通过乡里、保甲等一系列基层组织来管理。在基层组织上面是郡县制，郡县、府县、道县、州县，以县为基础的地方政府，上面是中央集权。官员不是世袭产生的，而是通过选拔制度（察举、征辟、科举等）选拔出来的。国家财政来源是赋税制度，不是靠田租。中国的这种国家治理机制，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基本如此，即便有时候词变了，框架结构也没有变。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员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中国早在秦汉就发展出现代国家。这套体制最大特点是中央集权和一贯到底，而且职业官僚，不是世袭，有一个税收体系，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这种中央集权的治理结构在西方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而在中国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在看待中国历史的这个问题上，中外达成了统一：中央集权体制是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完成的体系，我们可以称为发明者。那么，世界上二三千年前国家治理结构是怎样的呢？整个非洲和伊斯兰世界都是以酋长为首的国家治理架构。当然，现在那里的大多数国家已经摆脱了这种形式，转为军事官僚来治理国家；但是，这样的传统仍长期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某些程度上，部落酋长的影响力要大于政府和国家。

再看欧洲，古代是城邦制，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希腊罗马城邦；中古是封邦；近代以来是联邦，地方自治是西方的传统。部落酋长是血缘的自治，城邦、封邦、联邦则是地缘的自治；但它们始终是自治的传统。而中国是中央集权传统。传统是以价值观为基础传承的，一代代的传下来，就成了传统。

国家治理结构差异的背后是一系列治国理政经验的差异。在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下，领主只能管辖自己的下属，不能越级管辖下属的下属，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与之对应的是世袭制，贵族也是世袭的。中国西周的世袭制与西方的封建制有类似之处，西周周天子只能管诸侯，不能管鲁国、齐国的卿大夫，即“我的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

在中国，皇帝是老板，官员是职业经理人，老板有权利开除职业经理人，但在欧洲，贵族身份世袭，贵族的权力也是世袭，社会固化程度很高。国王与贵族是第一大股东（第一贵族）与普通股东的关系。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贵族世袭，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而平民阶层可以通过察举、科举获取身份、地位，可以与贵族小姐联姻，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西厢记》就反映了这种现实。但是，这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二）经济生活

中国具有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特点一是早，二是规模大，三是持续，这是我们的传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经济）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货殖”，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第一个企业家是范蠡，范蠡懂市场经济，他曾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

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说，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贵了就像粪土一样抛掉，便宜了就像珠宝似的买回来。财币进进出出，就能增值。这就是范蠡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判断物价走势，根据物价走势随时采取进出货的措施。第二位企业家是子贡，他是孔子七十二贤中经商做得最好的，是道德楷模，帮助孔子做了很多事情，建功立业。第三位是战国洛阳人白圭，宋真宗把他封为商圣。

中国从唐朝就有汇兑、汇票、支票，宋代在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作为交换的凭证。而在西方，直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才开始发行纸币，整整比我们的宋代交子晚了六七百年，比通行全国的“大明宝钞”也晚了三百多年。这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达。

汉初60年，从刘邦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休养生息，那时是中国经济最宽松的时候，社会财富极度发展。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就是说，汉初的时候，皇帝出行都乘坐不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马车，有的将相只能坐牛车出行。60年以后，“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后来，出现了贫富差距。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即经济高度膨胀的结果导致了贫富分化和政府管制的困境。所以，到汉武帝时，调控、打压过度膨胀的商品经济，这就是“重农抑商”意义的本质。古代政权普遍重农抑商，但这四个字绝不是表面的意思那么简单。因为商品经济会大幅度促进经济发展，商业的发展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农业经济时代，这种贫富分化问题难以通过社会福利得到解决，因此严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就必须出面干预，是为“重农抑商”，其实这也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繁盛程度。

中西在经济活动领域有两个差别：一是土地买卖的差异。中国的土地可以买卖；西方的土地，包括日本的土地，总体上是不能买卖的，马克思称之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二是货币。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上使用铜钱和纸币，买个盐、买个醋，就起作用了，在西方则更广泛地使用金银币。

（三）社会制约机制

约束社会其实就是约束人的本性。西方讲人性的解放，其实人性是不能解放的，人性是要约束住的，人性一解放，就成了动物了。什么是人性？《孟子》里有个人叫告子，他说：“食、色，性也。”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没有饮食，生命不能保存；没有男女，种族不能繁衍。人类之所以成万物之灵，能够超越所有比人类还强悍的那些动物，从野蛮走进文明时代，就是人类把握住了自己的本性。

丛林法则是谁的爪子锋利，谁的牙齿坚硬，谁的拳头大，谁就获得一切。丛林法则是野蛮时代的事，人类社会文明就不能实行丛林法则。即使权势大、牙齿锋利，也不能强霸别人的东西，这就是规则。这样，社会就约束起来了。

社会靠什么约束，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人类构建了一系列机制——法律、道德、宗教。

法律从国家层面，道德从社会层面，宗教从个人层面来制约人的本性。法律是国家层面的他律、外在的约束。国家就是保护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者有罪。一个国家不能保证居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这个国家就乱了。所以，依法治国很重要，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没有法律是不行的。

道德就是自律，自律就是自己管住自己，是自我约束。同

时，道德不仅仅只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在公共场所吐痰是不道德，在家里吐痰只是不讲卫生而已；在家里吸烟是生活方式不健康，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就是违法；在公共场所赤身裸体是要流氓，在家里赤身裸体就是个人行为。比如：魏晋时期有个人叫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喜欢喝酒，喝醉了，就裸形坐屋中，有客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裋衣，诸君何为人我裋中？”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为何钻到我裤裆里了，不能说他不道德。

道德还是理性，什么叫理性呢？就是理智地控制自己。

宗教信仰就是信则灵，不信则无。宗教都是让人着迷地相信。迷信不是负面词，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所有的宗教都是让人相信，它用戒律来约束信徒，因此宗教都是清贫的，戒律才管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传统的文明逐渐被解构了。现代化的第一波浪潮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主要是对神学的冲击，要冲破的是宗教神学对人的约束。现代化的第二个浪潮是追求平等自由，主要是冲破法律的约束。平等自由是对现有法律的某种松动、某种改变。现代化的第三个浪潮是开放，开放是冲破道德约束力，往往表现为对于传统道德的反向运动。不开放的时候，结婚后才生孩子，现在是有了孩子才结婚。不开放的时候，男的和女的结婚，现在开放了，出现了同性结婚的现象。我们发现现代社会与过去不一样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甚至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都看不惯了；过去的约束是严格的，现在约束力度则变弱了。

法律、道德、宗教，他律、自律、戒律，这三重机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都不相同。西方重法律，南亚、西亚、北非地区重宗教，中国人重道德。